

THE HARVARD LECTURES

THE HARVARD LECTURES



哈佛演讲录

近代欧洲的道德与政治

The Harvard Lectures

迈克尔·奥克肖特著

顾玫译 方刚校



95
3



上海文艺出版社



D091
A38

哈佛演讲录

近代欧洲的道德与政治

迈克尔·奥克肖特著
顾 玫译 方 刚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权)图字: 09-2001-18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佛讲演录:近代欧洲的道德与政治/(英)迈克尔·奥克肖特著;顾玫译
方刚校.-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

(不死鸟丛书)

ISBN 7-5321-2443-6

I.哈… II.①奥…②顾…③方… III.思想史-西方国家-近代
IV.B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180 号

责任编辑:鲁刚

封面设计:王志伟

哈佛讲演录

——近代欧洲的道德与政治

[美]迈克尔·奥克肖特

顾玫译

方刚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875 插页 2 字数 86,000

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 7-5321-2443-6/I·1930 定价:12.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2431136

导言

肯尼斯
·米纳格

迈克尔·奥克肖特于1958年的4月在哈佛所做的这些演讲,也许首先应当被视为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件。他应邀接替卡尔·弗雷德里奇的教席,学术观点与其前任截然不同。在学生眼里,他不是个威严古板的教授,相反,他是轻松随意的,通常身穿绿格茄克,打条纹领带。整个系列演讲使听众如痴如醉;事实上,人们常常发现,他在午夜之后,仍在他住处——劳威尔楼的地板上,盘着双腿,与大学生们一起聊天。

当然,奥克肖特的赫赫声名,大部分起源于他在《剑桥杂志》(Cambridge Journal)担任主编的时期,如他习惯的节俭方式,那时他除了有一名兼职秘书外,没有其他任何帮助。他在那本杂志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后来收集在《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in Politics)^①一书里。1951年,奥克肖特年过五旬,获得了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科学的席位。应该强调的是,无论他在哪里讲课,他总是保持一个剑桥人的风格。在伦敦经济学院,他的任务之一,是作30课时的政治思想史讲演。人们也许会认为,那时的讲演稿与这里收录的讲稿可能是同样一些东西。事实上,它们之间

① 《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出版于1962年,这个版本后为提莫西·福勒(Timothy Fuller)的1992年的自由出版社(Liberty Press)的版本所代替,这本书包括了奥克肖特以前尚未出版的论文,比如“代议制民主下的大众”(The Masses i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一文(这篇论文的内容与演讲录内容相关),我曾经问过奥克肖特,在原先的版本中为什么会遗漏这篇论文。他回答:“我只是忘了。”

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原因在于,奥克肖特把每一项新任务都看作是一次机会——重新思考他所研究的问题的基本原理的机会。他来哈佛后也是这么做的。

人们普遍认为,讲授政治思想史如同一种学术走钢丝行为。常常会陷到不相干的枝节问题上,进行错误的分类,错误判断各种细节,甚至导致完全的谬误。近几十年来,整个政治思想史学科内容日渐丰满,这是因为作者们在此一领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具体研究,也得益于不同思想流派在方法论上展开的广泛论战。为找到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人们对诸如文本、背景、意图、语言、范式和许多概念进行了论辩,意欲重新认识早期思想者们的理论要义,论辩的结果,自然大大开拓了我们理解政治思想史的眼界。不过,这一开拓所取得的最为成功之处,却在于突出了这样一点,即思想史家研究的范围越广,那么他就越有可能失败。

奥克肖特倾向于抛弃方法论常规,试图从寻求所提出的问题及答案间的确切关联入手,对政治思想史进行哲学层面上的自觉思索。首先,有大量背景和目的不同的论文对“政治思想”一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在这一领域中汇集各家思想而不加批判的最典型的是萨宾因(Sabine)的著名教科书,奥克肖特也认为它不失为一项大胆的尝试。作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系的教授,当奥克肖特着手梳理从希腊到当前整个一部政治思想史时,他有时会使用一个“区划”(plot)来概述,这一“区划”在他著名的对《利维坦》(Leviathan)一书的介绍文字中被使用过。在那本书中,他区分了两种非常古老的政治思想传统。其中一种思想(柏拉图的名作《理想国》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作)认为公民联合体(civil association)是按照理性与自然的理念建立的;另一种思想(霍布斯是典型的代表)则认为公民联合体是由人的意志与人

为机巧而建立的。这些方向性(orientation)的观点使他觉察出近现代世界所浮现的第三种思潮,即认为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国家只是人类联合体中的一个特例。这种联合体是由那些“因选择或变革而走到一起”的人所组成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出一种自己的特性,一种既不同于理性,也不同于意志的特性。他有时称这一思潮为历史的连贯传统。黑格尔和伯克的理论体系不同,但他们都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

奥克肖特研究方法更深入的一个特征是,廓清各种不同的政治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廓清”(clarification)这个词确实太平凡,难以表达他为此所作的努力,也许我们应该发明新的术语来表达,比如“分梳”(unmuddling)。他认为国家(像城邦和平民)是联合体的一种形式,政治的基本问题涉及两个方面:第一,联合体权威的建制是什么?第二,国家诉求的各种活动是什么?它理应追求什么?即使是这样一个基本概念工具,已足以使他找到一些政治思想家普遍遭遇的困惑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这一困惑来自于这样一个理念,即认为一定的政府建制将需要具备某一具体的行为类型——比如,康德赞成共和政体,因为他认为这种建制会自动追求和平;而潘恩(Paine)赞成民主政体,因为他认为民主将会降低政治成本。

奥克肖特不采用当代的方法论。他的这种做法使我们相信,政治必须依据其特定的背景去理解。但是,即使能够避免把背景视为理论,还是有许多东西可能被当作是背景,典型的如迈克法森(C. B. Macpherson)依据十七世纪增长中的资本主义体系来理解霍布斯的理论。奥克肖特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系的讲演,首先讲述的是当今所谓的“政治文化”,它来源于那些西方政治思想家分别从属的四种“经验”之一。四种“经验”是希腊、罗马、中世纪和近代。通过观察那些时期人们表达自己所用的词

汇,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奥克肖特仅仅从与自己的演讲相关的角度出发,在更抽象的层面上进行更深一步的阐述。这种方式有时会得出很奇怪的评判——比如,以亚里士多德更接近于希腊时期的“经验”为理由,把他放在柏拉图之前。但是,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它是相当成功的。

在接下来的哈佛演讲录中,奥克肖特感兴趣的只是十六世纪以来的近代政治思想。即便如此,他还是深入历史模式探险,并提供了堪称典范的审慎思考。那些熟悉《论历史及其他评论》(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一文的读者会发现,他是以反思开头的,而那些反思是那本书最为动人的地方。我们的读者也会很快发现,沉浸于精神生活的奥克肖特是如何进入自我反省的,使得这些讲演在历史与哲学材料之间总是保持平衡。

我们提到过的背景(context)可能意味着许多东西。当奥克肖特以此来思考近代思想时,他推断道,这里的背景不可能从社会环境或历史事件中找到,而是存在于欧洲人日益改变着的道德信仰中。接下来,他得在这里给我们讲述在别处可以“节略”的故事。欧洲人从中世纪继承下来他所谓的“共同体道德”(morality of communal ties)。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这种道德存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从十六世纪起,有一种“个体道德”(morality of individuality)开始逐步取代这一道德。当个体渐渐显现价值,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信仰、行为和职业时,个性道德观就开始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个体的自主活动与他人同样的行为可以兼容并存;除此之外,这种个性道德观还认为,对人类而言,个体自主决定自己行为是惟一正当的生活方式(原文第32页)。我的一本节本的摘要中将清楚地显示,我们已经精细地编制了一个有关近代性的为人所熟知的故事版本,这一故事时而讲述资产阶级,时而讲述那些有主见的、独特的(inner-directed)

个体,时而讲述新教伦理。它也以其他形式出现,比如,很有代表性的作者蒙田(Montaigne),以及道德伦理家康德。但是如若不限定具体背景,这些人的理论也会被完全误解,或者仅流于荒诞。正是这些忍受着日益扩大的政府活动的道德,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奥克肖特阐述其个人主义政治理论时,就将这一类思想家划并为个人主义理论阵营——如洛克(Locke),潘恩(Paine),伯克(Burke),和密尔(Mill)。

个人主义思潮的出现当然是近代最引人注目的道德革命,然而,许多欧洲人并不愿意贸然拥抱个人主义。我们通常认为,欧洲人的生活兼具个人主义,又固守于公共传统。不过,奥克肖特的观点是,生活中当个人主义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会破坏公共关系道德,但是通常不能取代它。社会上有一大批人,他们“不能或不愿”自己作选择,这些人就是奥克肖特所说的“反个人主义”道德的基础。在这种道德观念里,宁取“平安”不取“自由”,宁取“团结”不取“进取”,宁取“平等”不取“自主”: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债务人,他们欠了“社会”永远无法偿还的债,社会也因此成了他们必须对“集体”承担义务的一种象征(原文第27页)。

奥克肖特对于这些新的道德观,持毫不含糊的否定态度:我们有太多“大众”(mass man)或者是他所谓的“反个性”的人。这样一种人为妒忌和怨恨所鼓动,他们的主要愿望就是希望受治于一个仁慈的政府,并创造出一种道德,使他们能从一种贫乏与内疚感中解脱出来,而这样的贫乏与内疚感通常是由那些有个性优势的人诱发的(原文第190页)。

这些人就是奥克肖特称之为集体主义政治理论的政治基础。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弗兰西斯·培根,早在培根著作中,就详细阐释了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的理念,为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繁

荣状态,人类必须合作开采地球资源,而政府就类似于资产管理
者。这种集体主义还生发出许多不同的理论模式,其中的一个
宗教版本创建于加尔文(Calvin)的日内瓦城。这种特殊的集体
主义思想的更详尽的一个版本集中在生产力(productivity)这一
观念上,这是由罗伯特·欧文、圣西门和马克思等人创建的。在
谈到马克思时,奥克肖特首先考虑的是人何以为人的根本问题。
道德而非经济,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这一点是奥克肖特与其
他思想家比如哈耶克(Hayek)的重要区别所在,而在其他一些方
面,哈耶克与奥克肖特有类似的观点。

奥克肖特还划分出集体主义的“分配论”流派,这一流派在
巴伯夫(Babeuf)及其合作者的理论中有清楚的表述,其核心理
念是平等分配现代社会中的财物。这些学说已逐渐在近代国家
占居优势,一个明显的倾向是,不把人当作独特的个体,而是生
产过程中无差别的人力资源。毫无疑问,奥克肖特认为,这种思
考方式未能充分显现人类发展过程中各种潜在的特质。

以上这些,可谓奥克肖特近代政治思想的基本框架。但是
仅有这些,远远不能概括这本高度浓缩的著作所涵括的种种思
考。例如,奥克肖特醉心于不同的理解途径,在其《论人类行为》
(On Human Conduct)一书中,他把这称之为“理解的有条件的平
台”。在本书第三篇演讲中,他指出了一条理解政治的不同寻常
的途径,这是他根据孟德斯鸠的思想来阐明的。这一思想路径
试图通过描述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显现的一套稳定的行为模式
(disposition)来揭示人类行为的“特征”。这种“特征”就是“人类
往往按自己的选择开凿出行动的轨道”,并且“趋向于逐渐破除
这些轨道本身的约束”。比如,也许有人会考察1789年大革命
前这段特殊政治阶段内,法国社会及古代制度(*ancien regime*)的
特征,或者十八世纪英国的政治特征。不过,我们在孟德斯鸠的

理论中可以看到一个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试图从总体上挖掘出近代欧洲政治的特性。奥克肖特正是用这些特定的时间段,重新考察了人们熟知的孟德斯鸠理论的三个部分:专制政体、君主政体和奥克肖特所谓的“民主政体”。

总之,这些讲稿简洁明了地提供了一个结构严密的框架,以便再现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内在逻辑;这些讲稿对于方法论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梳理那些人物对政治的各种理解,在各种理解的关联点上,奥克肖特使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许多著名人物浮现出来。他们其实也表达了很多奥克肖特自己的哲学。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思想没有定型以前,极为挑剔。他自己并没有挑选这些讲义来出版,相反总是怀疑自己的思想不够成熟。然而,在散发这些讲义之前,奥克肖特很仔细地整理过。这就使得我们眼前的这本书,已经获得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形式。

肯尼斯·米纳格

1993年5月

目 录

引言：	肯尼斯·米纳格 1
第一卷：统治行为	1
一 政治思想史	2
二 近现代欧洲的道德与统治	16
三 关于对近代政治“特征”的研究： 孟德斯鸠	29
第二卷：个人主义政治理论	45
<hr/>	
四 洛克：具有神学色彩的洞见	46
五 康德、亚当·斯密和伯克	59
六 边沁和密尔	74
第三卷：集体主义政治理论	88
七 宗教的见解	89
八 生产力学说和分配学说	101

第一卷

统治行为

一 政治思想史

每个人在阅读历史事件记载时,通常会形成某种概念性框架。这种框架并非是他虚构并加之于这些记载之上的,而是源于他相信这是自己从事件研究中萃取的历史真实,从而使自己的思路有序连贯。当置身于最幸运的境况时,几乎无须讨论此种概念性框架;也不必精心阐释,它始终在潜意识层面运行,也许会留待后来的批评家去揭示和解释。假如这个人不得不对自己这一概念性框架交代一个概要,但是时间又不充裕,他只能采用一种简洁交代,也可以得到谅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是借此指出(而不是证明其框架的合理性)他打算研究的方向,在他的视野中他认为重要的特征,以及他认为关联问题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考察就先从所谓政治思想史的一般概念入手。

历史是一种活动,在其中我们力图使自己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理解性并不是从一般可理解的事件,例如从普通法的运作,或者从一般的原因所导致的结果中发现的,而是从角度不同的背景中观察特定的历史事件,才能把握理解历史。如果我们认为人类行为有一种既定规范,那么他们的外在行为就具备了某种可理解的特性,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行为规范是某种人类特性的外在表现方式,那么这种行为规范本身也变得可以理解了。而一旦我们不认为这样的行为规范能永恒不变,但也不认为这

是一种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任意选择,而是一种在特定背景下展示的特定规范,那么这种人类特性就会更具体、更实在。而且,这种对可理解的追寻,也许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扩展而延续。当我们确信,结论之正确并不在于任何不证自明的真理,而在于形成这些结论的一系列推论的过程中,是展示在某一特定的时空背景里,我们的结论就不至于失之武断或错漏。一个人的家世也许可以反映在他的脸上,但是只有当完整的宗谱——每一处都经过了考证,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才可以真正确认其身世。这样理解历史事件的方式,也许会使许多问题悬而不决,也许只能使事情不像原来那样神秘,也许它所传达的可理解之处也仅仅是一种幻觉,但它至少是一种适度的想象。

可见,按照我的理解,所谓政治思想史,就是试图把这种可理解性不断添加入思想中,而这种思想来自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对政治的看法。历代史学家所关心的,不仅仅是人类是否接受某种思想,他们还要关注使这些思想可以理解的背景条件。他不能把他所表达的意见当作一种凭空产生的主张,而只能视为按照某种既定的步骤进行思考的结果,这就好比那些具有特定家世的人那样,那些人的神秘面纱可以从考察其宗谱、考察其故土等广泛背景中来揭示。

一个历史学家无论以什么作为他的兴趣的中心——是三十年战争,还是十五世纪威尼斯式绘画;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还是祭祀庆典;是一次事变,还是一种教条;或者仅仅是某一个人的活动——他所关注的对象,总是与一种特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立刻就会认识到,他所质疑和思考的主题与其周围的背景是密不可分的。这就好比我们要解释一下特定的句子或某种特殊的陈述,就必须先理解与这一句子相关的文章背景,即上下文内容。同样,政治思想史家如何看待统治行为和被统治

过程,也要立足于他对如此行为和经历所处的特定的、直接的背景理解。他所思考的这些东西正是他试图解释的。而他所思考的这些活动,在持续进行过程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又将成为引发史学家思想转变的新的、直接相关的背景(而不是原因),这种新的思想转折也许是他所期待的。政治思想家并不是要去建立一个政府,或者寻找这么做的途径:他们着眼于理解当下的统治行为,反思这些行为,也许还企图去改变这些正在进行着统治行为。

当然,一旦历史学家发现他不能以原先的背景为研究前提时,他就必须先考证这些背景资料。如果他在研究三十年战争时,先是以战争史为其背景,那么很快就会发现它还牵扯到特定的外交、宗教等背景内容。如果历史不仅仅是对事件发生过程的描述,还关涉人类反思的话,那么,就难免要接纳另一些特殊的背景内容,以使原先的背景延伸;为了弄明白这一领域内与其他领域的相关内容,人们还需要运用一些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的概念和推理。从政治学中汲取的推论,往往会对宗教和科学思想产生导向性作用;而源于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物理学、战争、宗教、商业行为和艺术行为等领域的有关概念,又会不断地影响政治反思;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不能,也永远不可能与我们对宗教、艺术和自然世界的理解相隔离。如果历史学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他的政治反思将会毫无结果。不过,为使政治理论可以理解,他首先必须把这些理论放进与此直接相关的背景中去考察:就是统治行为和被统治的经验。

假如说,需要进行政治反思的文献资料直接背景,指的是统治行为和被统治的经验,那么,就有必要对这个背景详加说明。从总体上看,昔日作者所持的政见以及所反映的内容都不属于这样的背景范围,他们反映的只是其所处时代特有的统治和政

治话语。换言之,为了了解一个作者的政治观点和理论,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这些背景指的是那个时代的统治活动以及被统治的经验。既然我们所关注的是中世纪往后的欧美的政治思考,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十六世纪以来统治的行政方式以及施政目标。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研究五世纪时的雅典政治,应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为背景,研究十四世纪欧洲政治,则以马塞流斯(Marsilius)描述帕多瓦城(Padua)的《帕西斯的保卫者》(Defensor Pacis)一文为背景,同样,与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的政治理论相适应的背景,是十五世纪后期的意大利政治状况,而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则是以十七世纪的英国为背景。即使有人非常强硬地坚持说他们所关注的只是政治史中一些恒久不变的问题,因而无须界定特定背景,实际上,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只能通过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得以呈现。

在接下来的讲演中,我打算讲的是中世纪之后欧洲政治的特征,以及诸多条件,这些内容构成我们将要讨论的政治反思的特定背景:不过,在此之前我想说明,我不能说已经从那些政治意识、目标和推论发生变化的种种过程中得出了什么结论,我想探讨的是,历史学家从这些变化中看到了什么。

赫尔辛格(Huizinga)注意到,中世纪的人只知道所谓实用艺术。人们包括艺术家自己也这样认为,艺术家就是对发生在中世纪社会中的各种活动进行描绘和说明的人;他们得有利于当时的现实生活,而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和价值标准从事这项工作。艺术不能脱离实际生活,而进入另一个虚构的、快乐的世界;艺术应是功利而实用的,它往往是为了维持某种虔诚信仰,为了留住对著名人物和事件的记忆,为了使陌生的面孔被别人知晓,为了家族的声誉和骄傲,为了装饰豪华的居室,或者是为

了给商人的生活添加一丝艺术气息。总之,艺术只是生活中其他活动的衍生物,它并非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活动。到了十五世纪,虽然对艺术的这种理解并未消失,也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新的看法渐渐浮出水面,艺术品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为了装点日常生活,可以因其本身的奢华或奇特为人所追慕。于是,历史学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引起了这个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一些作者在解释这一变化的时候,把这种对艺术品的新看法视为理所当然,他们认为,精神层面上的观念更替与外部世界没有明显关联,人们只不过开始认识到艺术作品之间有高下区别,艺术家也不再只是生活中的伴唱者,而成了某种美丽的创造者,这种变化开始被人们慢慢接受了。很显然,如此简单的解释,至少无法解答历史学家应当追寻的问题,也就是说,从这些解释中无法理解这一变化何以发生。按照赫尔辛格对此问题的理解,他认为,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人们意识到为了收藏而堆放在王公贵族金库内的艺术品,同为了实用而设计的物品,这两类东西的着眼点和鉴赏情趣大不相同,于是艺术品只为了装点生活、只有实用价值的观念就发生了变化。这种新的鉴赏情趣来自于一种保存艺术品的新方式——收藏和展示,新品味并非有意设计,仅仅是由于艺术品过多才发生。总之,赫尔辛格是通过外部世界中一些偶然性的事件,来解释这一新品位是何以发生的:艺术画廊是社会环境变化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设置的结果,与旧的、实用的观念截然不同,它是一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产物。

现在,我来讲讲政治思想史家应如何开展他的研究。他要分析涌现出来的对政治的新的看法,解读有关统治职能的新文本,分析一些有新意的政治新词汇,并用新方法重新阐述一些制度的惯例;同时,还要不断地问自己: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